

《文史通义》中史心文笔意义的建构

周 杭,陈润叶

(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,湖南 湘潭 411201)

摘 要: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是继《文心雕龙》《史通》之后的又一大通论性的文史理论著作。从历史学角度看,章学诚的理论在二者的基础上,思想高度有了进一步提高。文史关系的建构从春秋时代就开始了。之所以形成“史心”为中心、“文笔”为工具的结构模式,要从文化背景、历史进程中才能得以陈述清晰。

关键词:文史通义;章学诚;文史关系

中图分类号:K203

文献标志码:A

文章编号:1674-5884(2014)01-0169-03

《文史通义》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(1738~1801年)的代表作,是一部史学理论兼文学理论的著作。它的内容包罗万象,涉及史学理论、文学理论、方志学、目录学等方面。此书与唐代刘知几的《史通》被看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。但他在许多方面对刘知几的理论有更进一步的发展。其中文史关系贯穿本书的始终。学术界多从思想角度、史学理论角度来审视它。本文把史学和文学结合起来,对它的文与史的结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阐述。

1 通论文史的时代背景

1.1 史学理论需要更深层的建构

在章学诚之前的文史通论著作主要有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、刘知几的《史通》。《文心雕龙》中《史传》主要论述历代史书的体裁变迁,阐述写史的规范,内容极为简略,多是从文章之学的角度分析史体如何写,对史学家的文章和文学家的文章有什么区别,史家写文的立意、行文规范等问题没有论及;《史通》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历史编纂理论,它包含了史籍的源流、史书体例、史书编撰方法、史官体制的沿革等内容。它较《史传》篇有了巨大的进步。但有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:

(1)刘知几《史通》是基于当时六朝淫靡的文风还深刻影响着唐朝时的写作,于是他提倡文贵简约。他认为,“国史之美者,以叙事为工;而叙事之工者,以简要为主……”(《叙事》),《史通》里面《浮词》《繁省》《点烦》都在谈论强调删繁就简的问题。

(2)他赞赏断代史而反对通史,就是因为通史内容繁多,如果每个朝代都修通史,那么会导致无意义的重复,

而断代史能保持一个简洁干净利落的体裁。这个问题从他“扬班抑马”观念可见一斑。

(3)他在史书记录原则上强调史书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,而在史书应如何反映客观现实问题上,他并未强调史书叙述与“历史真实”之间的吻合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,董狐写下“赵盾弑其君”之事,这本来与客观真实不符,董狐却被他称为良史。刘知几极为提倡这种“秉笔直书”的精神。这反映刘知几所言之“直笔”强调的不是还原历史真相,而是强调史家应该以刚直不阿的秉性写下自己所坚持的观点、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事件。

从这三点来看,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局限于文章的语言层面、史书的体例层面。他在史学思想上还有待突破。文字减少,那么文章所传达的信息也就会减少。若想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意义,那么文字本身就需要蕴含更多暗示。刘知几没有提出如何解决“文约而事丰”带来很可能事与愿违的后果。断代史虽然能够解决后世修通史造成的重复叠加,但是不言通史,而只言断代,缺少融贯古今的大气魄,在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问题上是乏力的。“秉笔直书”的“实录”精神实质上是一种文学家式的实录(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见解、情感),文如何才能符合史实的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。究其原因刘知几在史学编纂的指导思想上没有突破,他使用的是其文学观,所以《史通》一书重点内容在其叙事理论。那么如何突破这一局限,从更高层面建构史书编纂理论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章学诚的肩上。

1.2 用文史之器,以“明道”“经世”

章学诚处在“乾嘉时代”,统治者推行了空前的文化专制主义高压政策,把整个学术文化纳入考据轨道^[1]。

经世致用思想受到空前的打击,知识分子只得埋头故纸堆,皓首穷经。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里“万马齐喑究可哀”,真切反映了这个极端专制的时代。许多人为了逃避现实政治,为考据而考据,本来作为学术手段的考据学成为学术的终极目的。

考据学专注于辨明读音、训诂文字、作记注、校勘书籍、辑录散佚的文献等工作。考据学家们深信“推末以致本”“积小以明大”的方法论,固执地保持着部分到整体的解释方向。部分构成整体,先从部分再到整体。所以,他们往往是从微观进行研究,其局限性在于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。他们研究史学文本,往往只注意到文本的语言层、现象层,很难在意蕴层面有所建树。

就考据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错,但整个国家的学术风气沉浸在这么一种氛围之中,就成了畸形的学术文化。章学诚深感文学、史学都溺于器而害道。它在《文史通义》中则反其道而行之,针砭时弊,强调史学文本的意义,提倡文贵发明,亦期用世,体现大道。章学诚在处理史书意义和史学文本的时候,遵循的是从整体到局部的解释方向。从史学的立意高度给史书编纂指引方向。从这个角度看,章学诚史学的理解先从整体着眼,观照局部,这是章学诚在文本意义上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在这种文化背景和政治社会下,章学诚深感史学亟需一个高度的理论来突破前人的局限,扫清乾嘉沉闷的风气,他在《申郑》篇疾呼:

郑樵生千载而后,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,而知作者之旨,不徒以词采为文,考据为学也。于是遂欲匡正史迁,益以博雅;贬损班固,讥其因袭;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,运以别识心裁。……自迁、固而后,史家既无别识心裁,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。

史书编纂要立意高远,追求史义而不可沉溺词采、考据的末端。如果没有别识心裁的史意作指导,史书编纂会沦为纯粹为写文而写文了,永远停留在文本的语言层、现象层,无法上升到史学思想意义高度。

无疑史义对史书编撰有重要的指引作用,它是史书富有灵魂的重要保障;文采词章对史书编撰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,它让史书表达功能、史书被接受功能等得到很好的实现。古人运字用词之间颇欠明晰^{[2]264}。故要论述清晰“史”“文”的含义要从章学诚的著作中去依据上下文具体分析。

2 章学诚文史关系的建构

2.1 “史心”“文笔”意义界定

史书的记载必须要依赖文字语言,没有文,就不能成其为史了。正如章学诚所比喻的“史之赖于文也,犹衣之需乎采,食之需乎味也。”而文字语言一旦生成,它本身所孕育的修辞、表现手法又会产生试图摆脱史的约束的离心力。如果过分依赖文采则会“竞于文辞而逐于末”,这

样就会让文采遮盖事实或偏离事实,导致“以文害史”。在章学诚的理论中,文与史的关系是有所偏重的。也就是他强调史的主体地位,文的从属性地位。那么,应该是如何偏重的呢,这要从章学诚对“史”“文”相关的意义上着手。

在他的史书编纂理论中,与书写文章有关的概念有“圆神”“艺术工巧”“敷陈讽喻,抑扬涵泳”“互文”“详略”等内容。它们表现为史书行文时的谋篇布局、修辞手法和表现手法,它涉及了现代意义上的史书体裁、义例、语言表述等方面的内容,本文不妨概括为“文笔”。为了为史书编纂树立一种指导思想,把文纳入到史的范畴,让文作为写史论史的工具,章学诚提出了“史义”“史家心术”“史德”“别识心裁”等概念,这些直接指向史学家的心意、思想和主见,本文不妨把它称之为“史心”。有了这么一种史家的心意,便可以对文笔起到一个规范性、指导性的作用。《文史通义》做到了通论文史,它跳出了刘知几的局限。一方面,章学诚立意高远,能透过文本的语言层和现象层,更多地指向意蕴层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;另一方面,章学诚遇到的时代问题与刘知几不一样。刘知几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摒弃魏晋以来的淫靡的文风,章学诚面临的则是晚清学术即将沉沦在朴学之中。

要突破前人的局限、响应时代的呼唤,要扭转乾坤,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会举步维艰。章学诚看到了这一问题所在,故而他论文史追溯到了“三代之衰”的春秋时代,从历史的源头指出学术的流弊,建构深远的史文结构。

2.2 史心:孔子修《春秋》——明大道

春秋时,孔子周游列国途中,见到王室受大国欺辱,诸侯战争频繁,百姓颠沛流离,他深感“王纲坠,大道隐,诸侯起”带来的混乱。回到鲁国后,孔子立志要在文化思想上重申周王朝的威严,重振纲纪,于是他便删述六经。然而,时易而事易,他删述六经并不是要重新回到历史的起点,其立意、删述的标准就是孔子自己心中的大“道”。孔子所保留的是自认为最能体现其志的内容^{[3]49}。《六经》不是空言,而是孔子依据古代史事和典章制度的“经世之作”。章学诚认为,孔子删述《六经》是为了“明道”“经世”。他说:“夫子曰:‘我欲托之空言,不如见诸形事之深切明也。’此则史氏之宗旨也。”(《文史通义·原道中》)

孟子曰:“其事则齐桓、晋文,其文则史,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。”^{[4]40}本来,六经最初只是以先王政典的书籍载体的形式存在着,是史料,而经过夫子“窃取其义”,便成为后世的经典。章学诚对这一提法甚为赞同。他说:“夫事,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;文,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。然夫子所取,不在此而在彼,则史家著述之道,岂可不求义所归乎?”(《文史通义·申郑》)史所表述的事、史书的文采是反映历史思想的途径和形式,他们都是存史义的工具、材料。也就是说,历史之所以区别于纯粹的记

事、记言并高于它们的原因在于史义所在。历史在追求史义的时候才成其为历史,才不拘泥于事、文。

至于孔子《六经》的史义如何,章学诚有一个详尽的说明:“史之大原本乎《春秋》,《春秋》之义昭乎笔削。笔削之义,不仅事具始末,文成规矩而已也。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,固将纲纪天人,推明大道,所以通古今之变,而成一家之言者,必有详人之所略,异人之所同,重人之所轻,而忽人之所谨,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,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,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,及其书之成也,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,契前修而俟后圣。”^{[4]37}章学诚认为,孔子在圣心独运,别识心裁的指导下,使得所编修之史(或者说是经)有纲纪天人、推明大道、通古今之变的作用。也就是说,史心的合理运用对史书乃至史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那么孔子在删述六经特别是编修春秋的时候,运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?他运用的是为后世所称道的“春秋笔法”。

2.3 文笔:春秋笔法——乱臣贼子惧

孔子修《春秋》时用“笔则笔,削则削”(《史记》卷四十七《孔子世家第十七》)、“以一字为褒贬”“直书”“微言”“褒讳贬损”(《汉书》卷三十《艺文志第十》)等原则去编修,以至于形成“微而显,志而晦,婉而成章,尽而不污,惩恶而劝善”的特点(《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)。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春秋笔法五例。通俗来讲,“春秋笔法就是文章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。”^{[5]218}

春秋早期,大国吴、楚之君已经僭号称王了,而《春秋》仍然记作“子”,小国宋国君却称“公”;群雄争霸时,周王的政策号令几乎在诸侯国中销声匿迹,周之正朔也已被诸侯们抛弃,而《春秋》在开篇明义:“元年春王正月。”旨在坚守王室正统须遵守,名分不可乱。

杀伐之事也意含褒贬。如“卫州吁弑其君完”“卫人杀州吁于濮”,因为州吁弑君自立,所以直书其名表明他弑君之罪。而州吁弑君后已经自立为卫君,而不称其为君,是因为孔子认为他不像君,故不记载为“君”,用“杀”带贬义,表达卫州吁遭受唾弃。类似此理的还有“郑伯克段于鄢”。根据《左传》的解释:“段不弟,故不言弟;如二君,故曰克;称郑伯,讥失教也。”(《左传》隐公元年~隐公四年)

春秋笔法贬损之义带来的后果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“春秋之义行,则天下乱臣贼子惧”(《史记》卷四十七《孔子世家》)。刘勰也有类似的评价:“举得失以表黜陟,徵存亡以标劝戒;褒见一字,贵逾轩冕;贬在片言,诛深斧钺。”^{[6]142}

《春秋》从立意到其文笔书写之法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,作为后世纪传体正史的开山著作《史记》继《春秋》创一代大典,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(《昭明文选》卷四一《报任少卿书》)。这种思想立意无不受到《春秋》的“义则窃取”影响,章学诚说:“司马氏

肇法《春秋》,创为纪传……折衷去取,可谓慎矣。”^{[7]982}它的讽刺艺术深受《春秋》微言大义、褒讳贬损之法的影响;它“多样化的语言技巧、雄健峻洁婉曲的语言风格”^{[8]304}等都受到春秋笔法中微而显、志而晦、婉而成章等原则的影响。它无疑将《春秋》的历史撰写理论发挥到了极致。这也是《史记》思想和语言高度统一的一个原因。这种从历史用意的角度去合理利用文笔的方法,只有圣人才可以如此做。孔子的这种作法也是他被后世称为圣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后世史学在书写历史的时候,无疑考虑到历史的惩恶扬善、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^{[9]396}的作用。章学诚很强调史学的“惩恶扬善”“明王道”“经世用”的作用,无疑是对其真实的写照。

3 结 语

综上,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说蕴含了一个从史到文、又从文到史的思维逻辑和史书的形成过程:即在圣人“义取经纶为世法”^{[4]39}的史心指导下,合理利用文笔的修辞手法、表现手法编修删订史料,撰写史书,从而达到思想、史事、文本的高度统一,或者说是史学文本上达到意蕴层、现象层、语言层的完美统一。章学诚本身就是一个史学家,《文史通义》一书中的史心一直是体现质的内容,是内在的,占主导地位,是它追求的目的所在;文笔则是体现修饰性、美化性的,是外在的,被支配地位,是实现史的意义工具。把握这么一种深刻的、源自于历史的源头的文史结构,理解《文史通义》中繁杂的文史关系问题就势如破竹、水到渠成了。它是稳固的,是突破前人局限的,对澄清时弊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仓修良,叶建华.章学诚评传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6.
- [2] 余英时.论戴震与章学诚[M].北京:三联书店,2005.
- [3]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.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[M].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4.
- [4] 章学诚.章学诚遗书[M].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5.
- [5]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.现代汉语词典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7.
- [6] 刘勰.文心雕龙今译[M].周振甫,译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7] 章学诚.文史通义新编新注[M].仓修良,注.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8.
- [8] 安平秋,张大可.史记教程[M].北京:华文出版社,2002.
- [9] 张载.张载集[M].王进祥,编.台北:汉京文化事业责任有限公司印行,1983.

(责任校对 郭源君)